

中國文學史

先秦兩漢部分

詹安泰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文學史：先秦兩漢部分/詹安泰主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0

(詹安泰全集)

ISBN 978-7-5325-5862-9

I. ①中… II. ①詹… III. ①文學史-中國-先秦時代～漢代 IV. ①I20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58382 號

詹安泰全集
中國文學史
——先秦兩漢部分

詹安泰 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4.125 插頁 5 字數 388,000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ISBN 978-7-5325-5862-9

I·2312 定價：42.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出版說明

詹安泰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古典文學專家，在文學理論研究、古典文學作品鑒賞及詩詞創作等領域均有傑出成就，發表過許多部有關古典文學的專著和大量論文，在學界產生過重要影響，至今對於古典文學研究仍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由於出版時間久遠，原書流傳稀少，不易覓求，為滿足專業工作者和古典文學愛好者的需求，本社推出這部《詹安泰全集》。

《全集》收錄了詹先生現存的各類著述，包括其生前親自編訂出版及後人輯錄而成的專著六部，編者新輯散見於各種報刊、雜誌的論文五十餘篇，旁及友朋往來的信札等，並按文體分類編排，是迄今為止最為完備的詹安泰論著總集。

所收文稿，均依據最早或最可靠的版本整理校訂。由於各書內容體裁有別，體例未盡統一，為保留原著的面貌，除改正明顯的文字訛誤、引文差錯等，其他一般不作改動，對於一些不盡符合今日習慣用法的富有時代特色及作者語言風格的表述均予以保留。

本卷為《中國文學史》（先秦兩漢部分），據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第一版整理印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一一年十月

序

吳承學 彭玉平

詹安泰（一九〇二——一九六七），字祝南，號无盒，廣東饒平人。自一九三八年起，詹安泰一直在中山大學任教，歷任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等職。他是我國二十世紀著名的詞學家和文學史家，也是著名的詩人、詞人和書法家。詹安泰在二十世紀的古典詩詞創作界和古典文學研究界取得了傑出的成就。他的詩詞創作淵源有自而能獨具面目，他的文學研究依託於深厚的國學根底和不斷充實的新理論與新方法，而呈現出涉獵面廣、體系性新，兼具開拓性和總結性的特色。他在詞學、《詩經》、《楚辭》以及文學史研究諸方面，在二十世紀古代文學學術史上，留下了一筆寶貴的遺產。

一

詹安泰博學多才，而用力於詩詞者尤深。他兼擅詩詞創作和詩詞評論，一九三七年出版第一本詞集《无盒詞》，一九三九年刊印了詩詞合集《滇南挂瓢集》。其詩詞學有淵源，踵承清季同光詩人「宗宋」之風，挹其芳潤，自造新境。詹安泰詩風曾有一個從「綺思」到兼有「雅怨」的發展過程。陳中凡在為《鷓鴣巢詩》所作的「題詞」中概括其詩風變化說：「當其淬厲初，綺思粲芳菲。流泉不擇地，珠玉倍毫揮。澤古既已久，落筆轉矜持。」最後以「情詞兼雅怨，文質窮高卑」而自成一家人。他的《鷓鴣巢詩》大致

按創作時代先後排序，循序而觀，其詩風變化昭然可見。詹安泰的中年主要在憂患亂離中度過，他自稱受梅堯臣影響特深，他在《激江苦無書讀，忽睹〈宛陵集〉，大喜過望，因題》中即自稱「壯歲獨喜都官詩」，對梅堯臣「深遠閑淡固莫匹，政以斂折窮覃思」的創作意趣作了精要的概括。特別是受聘中山大學之後，先後隨學校遷移雲南激江、廣東樂昌等地，在顛沛動蕩中從事詩詞創作和學術研究。身逢亂世，性復憂鬱，不過他認為這也許是詩情表現的最好機遇。他在《邵潭秋遠貽〈培風樓詩存〉，作此報謝》詩中說：「夢覺河山不肯清，中年哀樂況崢嶸。何難唐宋共爐冶，別有才腸携手生。」（卷一）其《上石遺先生》稱贊石遺先生：「我公一鼓通宋唐，詩鈔詩話詩教昌。……尊杜工部韓侍郎，旁推孟白兼歐陽。都官半山蘇陸楊，不袒苦陳門硬黃。金元明清誰短長，自然體大大無方。」（卷二）這雖是對石遺詩歌特點的總結，也不無夫子自道的意味在內，體現了詹安泰的宗宋並不拘泥於宋詩派，而是要博師百家，融合唐宋，歸於自然，自出手段。所以這一時期的詩歌雖然仍不無「綺思」的影子，但思慮却更趨深沉了。他追求的不是一己之閑愁，而是與時代環境息息相關的深愁，所以他的詩歌更多地表現出沉鬱而勁拔的風格特色。

詹安泰十二歲開始寫詞，一直到去世，持續了半個多世紀。三十年代前期，詹安泰創作了大量的詞，並與國內詞學名家夏承燾、胡光燁、龍榆生等廣泛交流，書札往返，詩詞唱和，詞藝日長，影響日大。他的詞頻繁在《國聞周報》、《詞學季刊》等刊物上發表，在當時詩詞界廣受關注。他的詞追師朱祖謀和嶺南名家陳洵。《无齋詞》卷一《大酺》，作於朱祖謀去世三年之後，乃為吳君懋題《彊村先生遺墨》而作，情詞眷眷，哀感無端，似正可印證詹安泰詞學與朱祖謀的源流關係。詹安泰詞學更多地受到南宋

姜夔與張炎的影響，他以「漱宋」名其室，已透露出其中消息。陳寂先生《爲祝南題〈漱宋室填詞圖〉》詩云：「无齋琢詞過廿載，顛倒二白百不疑。」詹安泰詞「顛倒二白」「二白」指姜白石與著有《山中白雲詞》的張炎，是大家公認的，而詹安泰的用力所在，主要是在傳承宋末詞人的幽怨與寄託。早期《无齋詞》創作於「兵火滿天，舉家避難」（《无齋詞序》）的年代，詹安泰轉徙澈江、坪石等地，他的詞較多地記錄了這段歷史和心境，可作一部詞史來讀。他的《聲聲慢·江亭重到，景物都非，感賦此闕》堪作韓山數年心情寫照，不僅整體風格與姜夔爲近，而且其表達哀怨的方式也別無二致。他的《齊天樂》作於流寓香港期間，情懷家國，眷眷不已。序云：「國難日深，客愁如織，孤憤酸情，蓋有長言之而不足者。」全篇孤憤酸情，意溢詞中，將「國難」、「客愁」和「孤憤酸情」盡情宣泄。

詹安泰的詞風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主要「取徑一石二窗」^{〔一〕}，即追慕姜夔、吳文英、周密的詞風，風格較爲清麗。三十年代後期以後，他承陳洵「問途碧山，宜所先也」之論，專師王沂孫，詞風偏重寄託。當代詞學家施議對認爲：「詹氏所作詞，每將家國身世之感寄寓其間，有着深邃的命意。而且，他的詞綿麗而有疏宕之氣，空靈之境及沉鬱幽憂之思，在當代詞壇獨樹一幟。」^{〔二〕}堪稱中之之論。

〔一〕 吳梅評語，轉引自蔡起賢《春風杖履失追陪》，《詹安泰紀念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七十三頁。

〔二〕 《當代詞綜·前言》，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三十九頁。

近代的嶺南詞派，久爲學界矚目。程千帆題《无齋詞》說：「本與海綃爲後進，還疑蘭甫是前身。」既是追溯詹安泰的詞學源流，實際上也勾勒出「嶺南詞派」的大致輪廓了。從陳澧、陳洵到詹安泰，嶺南詞派正堪稱一脉相承，詹安泰作爲嶺南詞派的殿軍，他在詞史的地位也由此而奠定。施議對編輯《當代詞綜》，分詞人爲三代，力主以夏承燾、龍榆生、唐圭璋、詹安泰爲現代「四大家」，詹安泰的詞入選三十首，入選數量與唐圭璋並列第三，他在二十世紀詞壇的地位可見一斑。

一一

詹安泰以詞學名世，他傾其畢生心力於詞學研究，從校勘箋注、專題探討到詞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其研究成果在二十世紀詞學史上具有非常突出的價值和地位。

在詞集的校勘箋注方面，詹安泰的《李璟李煜詞》和《花外集箋注》兼具開創和集成的意義。他對「二主」詞的關注由來已久，一九四七年，他發表的《无齋說詞》已論及二主詞。一九五六年八月五日，《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專欄發表由詹安泰主持的中山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教研組老師參加的《關於李煜及其作品的評價問題》的座談記錄。同年八月二十八日，《文學遺產》專欄同期刊發詹安泰與陳培治關於李煜及其詞的商榷文章，掀起了學術界關於李煜詞評價的大討論。一九五七年，詹安泰又在《中山大學學報》第一期發表《李煜和他的詞》的長篇論文，比較系統集中地闡述了他對李煜及其詞的看法。與此同時，詹安泰展開了對二主詞的系統整理。《李璟李煜詞》出版於一九五八年，長達數萬言的《前言》即由《李煜和他的詞》一文增刪而成的。詹安泰以宣統年間沈宗畸《晨風閣叢書》刻王國

維校補《南唐二主詞》本爲底本，博參南宋以來各種版本，兼取有關二主詞的專集、選本、詞話、筆記等，互相比勘，精審以求，終使二主詞得一新善本，堪稱二主功臣。在編列次序上，詹安泰改變了以往既不按年代又不按詞牌編排以及漏收或誤收的混亂情形，根據最新的學術考訂，或增或刪，並大致按創作年代來排列，帶有編年的意味，其目的就是爲了使讀者對李煜的生活經歷、思想感情和創作活動轉變的過程，可以「看出一些綫索」（《李璟李煜詞》「附識」）。詹安泰的注釋大都簡明扼要，對一些有爭議的作品、句意隱晦或比較特殊的用法，則博徵有關材料，而自出裁斷，所以該書具有研究與普及相結合的特點。

《李璟李煜詞》一書的主要價值體現在對二主詞的評價上。李璟的詞現存僅四首，主要寫男女情事。但詹安泰認爲，結合其生平來看，李璟的詞特別是《浣溪沙》兩首其實是有很充實的生活內容，顯示出特有的藝術風格：白描的手法，轉折靈活，意境闊大，感慨深沉。而這種風格「《花間集》裏是找不到的」（《前言》），是李璟的獨創。王國維《人間詞話》曾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詹安泰則認爲：「李煜詞這種特徵，有部分是受他父親的影響，繼承他父親的傳統而發揚光大的。」（《前言》）這種溯源對認識李璟李煜詞的關係以及李煜詞風形成背景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新見解。

五十年代中後期，學術界對李煜及其詞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由於受到階級觀念的影響，不少參與討論的學者從概念或定義出發，在價值評判上出現了庸俗社會化的傾向。詹安泰作爲這場討論的主要成員，一直強調以李煜詞的文本爲主要依據，參酌其生平經歷，他在《前言》中說：「我們研究李煜

詞，應該把李煜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切實地確定在詞這方面，詞外的有關李煜的東西，只能作爲理解他的詞的引綫或幫助，而不應該硬把他的詞裏所沒有的東西來評價他的詞。」他對李煜詞的研究牢牢地立足文本，以相當開闊的理論視野和充實的歷史材料作爲評論的依據，許多見解至今仍具參考價值。如關於李煜詞中描寫的男女關係是否屬於愛情的範疇，此前的意見相當紛雜，詹安泰從李煜與小周后從私通到納后再到入宋後的共患難的經歷，認爲：「從他們兩人一生的關係看來，在小詞裏雖然沒有表示出堅貞純潔、生死不渝的信念，事實上，他們之間的愛情是相當深厚的。」（《前言》）詹安泰的這一理性的學術分析確實是能够經受歷史的考量的。對於其他諸如李煜愁情詞受歡迎的原因、李煜入宋後的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和愛國主義思想等問題，詹安泰都表明了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後來也大都爲學術界所接受。

清代中期以後詞學，大體奉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中提出的「問途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的主張爲創作金針，但作爲填詞起點的碧山詞一直沒有一個完整的注本，這不獨直接影響到對王沂孫詞的解讀，而且使清代中期以來綿延已久的學詞途徑停留在模糊影響階段。雖然張惠言在《詞選》即云：「碧山詠物諸篇，並有君國之憂。」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也說：「讀碧山詞者，不得不兼時勢言之，亦是定理。」但實際上碧山詞中究竟有怎樣的「時勢」和「君國之憂」，却一直含糊未明。其間雖有端木采等在創作和理論上光大王沂孫的詞學，但從王鵬運開始，經朱祖謀等人的弘揚，填詞創作實際上是越王沂孫而直達吳文英。除了少數詞人仍在關注外，王沂孫已消退在主流詞學之外。詹安泰受聘中山大學，主要是繼陳洵之後來主講詞學，陳洵曾深受朱祖謀愛接，但在致力夢窗詞的同時，

也頗致意於碧山詞。詹安泰在詞學理念上，也贊同陳洵「問途碧山，宜所先也」的主張，對王沂孫詞用力頗勤。他的《花外集箋注》大約在三十年代初即已開始，一九三六年完成初稿，此後又經三十餘年斷斷續續的增補，始成完帙。它是作者在研習之餘「隨筆札出」的基礎上，加以系統校注箋釋而成。「茲編所錄，僅其一部：即專言寄託，間疏名物；其諸采藻之注釋，文藝之批評，有關旨要者，亦爲羈入。」（《花外集箋注·自序》）可見其書探研的重點和涉及的範圍。

王沂孫詞大部分爲詠物詞，格高意遠，含蘊幽約，大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詹安泰本常州派開山張惠言「意內言外」之旨以說詞，箋評中引張惠言、周濟、陳廷焯之說獨多，可見其光大常州派學說之初衷。在體例上又依朱祖謀《夢窗詞小箋》之例，以史證詞，以詞證史，故而創獲頗多。如有的學者認爲王沂孫入元後曾仕新朝，有的則力破此說。詹安泰根據王沂孫詞融情於物的特點，從《花外集》中採擷了不少詞句如「正恐黃花，笑人歸較晚」（《齊天樂》）和「故國如塵，故人如夢，登高還懶」（《醉蓬萊》）等，推測其確曾出仕，但可能迅即有歸隱之意。他還引周密《憶舊遊·寄王聖與》「天涯未歸客，望錦羽沉沉，翠水迢迢。歎菊荒薇老，負故人猿鶴，歸隱誰招。」以及張炎追悼王沂孫的《洞仙歌》「野鵲啼月，便角巾還第」等詞句互相參證，藉此大致梳理出王沂孫入元後的大體經歷和基本心態。

由於詹安泰注重對王沂孫生平行實的考訂，所以他對碧山詞中的寄託往往能勾沉索隱，發前人所未發。如《天香·龍涎香》一詞，清代評說者亦曾關注，如許昂霄《詞綜偶評》只是追溯了有關龍涎香傳說的來歷，顯然只是把它作爲一首純粹的詠物詞來看待。詹安泰則引周密《癸辛雜識》所載張士傑兵敗崖山，焚香拜天之事，認爲「碧山此詞或係詠宋亡事」。詹安泰並逐句詮釋其可能的事實背景。兩說

比勘，詹安泰的引證顯然要更爲契合王沂孫的詞心詞境。再如《齊天樂·蟬》（一襟餘恨宮魂斷）詞，清代陳廷焯、端木子疇已多有發微，但多爲猜測之詞。詹安泰根據夏承燾的考證，《樂府補題》中的詠物詞，其創作時間皆在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後，而且《樂府補題》中的賦蟬之作，十詞九用「鬢鬢」之語，則其與孟后陵之事的關係自然至爲深切。《花犯·苔梅》中的「蒼鬢素靨」、「明珠輕委」等句，也被詹安泰認爲是此詞「託喻后妃」的有力證據。可以看出，詹安泰對王沂孫詞中的託意，是從一個互相聯繫的整體來作全面考量的。而且他的立論往往是從辨證舊說開始，而以闡明新說作結，這種建立在歷史考證基礎上的知人論世，自然顯得特別有力度。從總體上說，詹安泰對王沂孫詞中寄託的探討是在宏觀把握宋末詞人的基本心態的基礎上，結合王沂孫的獨特經歷和當時歷史所作出的分析。作爲《花外集》的第一個箋注本，詹安泰以積三十餘年的功力，苦心探賸，扶隱發微，博徵宋以來的史傳以及各種詩文別集等，平衡裁斷，照辭如鏡，爲讀者揭示了一片相當清晰的王沂孫的文心詞境，其開闢榛莽之功，理應得到珍視。

詹安泰治詞學，注重體系性，最能體現其詞學思想體系的當屬《詞學研究》一書。此書列《論聲韻》、《論音律》、《論調譜》、《論章句》、《論意格》、《論修辭》、《論境界》、《論寄託》、《論起源》、《論派別》、《論批評》、《論編纂》十二章。其纂述動機在於創立真正意義上的「詞學」，他認爲從清代中期以來，雖然出現大量傑出的詞話類著作，或考證音律，或品藻詞藝，或創立宗派，或指示階梯，雖各有勝場，但畢竟沒有建立起「詞學」的規模。詹安泰兼顧「學詞」與「詞學」，旨在建立一個具有內在邏輯的詞學體系，他在《詞學研究·緒言》中說：

聲韻、音律，剖析甚嚴，首當細講。此而不明，則雖窮極繁富，於斯道猶門外也。譜調爲體制所繫，必知譜調，方得填倚。章句、意格、修辭，俱關作法，稍示途徑，庶易命筆。至夫境界、寄託，則精神命脉所攸寄，必明乎此，而詞用乃廣，詞道乃尊，尤不容稍加忽視。凡此種種，皆爲學詞所有事。畢此數事，於是乃進而窺古今作者之林，求其源流正變之迹，以廣其學，以博其趣，以判其高下而品其得失。復參究古今人之批評、詞說，以相發明，以相印證，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其有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者，爲之衡量之，糾核之，俾折衷於至當，以成其爲一家言。夫如是，則研究詞學之能事至矣，盡矣。

在這十二論中，前八論爲「學詞所有事」，側重以「學詞」來建立「詞學」，後四論則是在學詞基礎上的推衍和提高。追源溯流以明其正變，參酌各派以廣其學識，參究批評而折衷至當，如此則詞學宛然已成專門之學。在詹安泰此書之前，只有吳梅的《詞學通論》是一部比較全面地介紹詞學基本理論和詞史的著作，但因寫作時代較早，還相當簡略。相形之下，詹安泰的《詞學研究》在理論性和系統性方面，顯然是後出轉精了。

《詞學研究》原十二論，只有七論流傳下來。這七論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內容：其一是關於詞的體制研究，主要涉及聲律、音韻和調譜三個方面。自清代以來，有關詞的韻、律、譜的研究就已漸受關注。浙西詞派獨尊南宋特別是姜夔、張炎一派的詞，即體現重視音律的價值取向。常州詞派提倡寄託，但對音律的重視也是不斷提高的。晚清四大家及其周圍的詞人，無論填詞創作還是詞學研究，都相當重視聲律。不過關於聲律的理論研究，還是比較零碎，不成系統。這除了與「詞話」這種著作方式有關，

也與整體的理論研究意識不足有關。詹安泰除了曾撰寫《中國文學上之倚聲問題》和《論填詞可不必嚴守聲韻》等專文來討論這些問題，在《詞學研究》一書中，更是以聲律問題來開篇，把它作為詞的體制和入門的關鍵問題。詹安泰詳細考察了有關聲律理論的發展歷史，認為就「聲」而言，唐五代宋初詞人，多僅守平仄，不限四聲。至柳永始辨去聲，周邦彥乃分上、去，至南宋姜夔、吳文英等，聲律益趨講究，這與南宋詞人對「聲音微妙之理，洞究無遺」的音樂素養有關。但南宋以還，詞的唱法失傳，聲情之美，無法一一按接，所以要追求四聲與古人盡合，自然不太現實，但退求其次，嚴守平仄還是必要的。就詞韻而言，詹安泰認為：「唐五代北宋詞，用韻殊泛，時入方音，取便歌唱，惟主諧適。」但南宋自朱希真作《應制詞韻》十六條，並得張輯疏釋，馮取洽增補，韻遂成為詞的重要體制之一。此後韻書繼出，但詹安泰認為，戈載的《詞林正韻》，以《集韻》為主，而參以《廣韻》，派平、上、去三聲為十四部，入聲為五部，共十九部，用力最勤。雖時或失之過寬或過嚴，但大體不差，所以他認為：「余以為今日填詞，不妨仍以戈韻為歸。」他並詳細考證了古人協韻之法，就何者需嚴協，何者宜寬協等具體問題作了細緻的闡述。

詹安泰認為探討音律問題，只是具有學術意義，已不可能重現當年樂聲之原貌，所以他說：「居今日而言古樂，則雖窮極精微，亦惟盡考據說明之能事而止，求其施諸弦管，豈美無礙，配之聲歌，纖洪畢合，不可得也。」詹安泰詳細考察了沈括、張炎、江永、凌廷堪、方成培、杜文瀾、張德瀛、鄭文焯、夏承燾等有關詞律的著作或論述，結合自己的理論思考和創作實踐，分五音十二律、五音演變及其讀法、宮調及譜字、律呂配譜字之異同、雅俗調名之不同、犯聲過腔、宮調與聲情之關係七個專題，在追溯音律發

展源流的基礎上，對詞樂的表現特徵作了分析說明。

毛先舒的《填詞名解》和汪汲的《詞名集解》對於詞的調譜解析已多，但穿鑿附會之處也不一而足。詹安泰專列《論調譜》一章，以確鑿例證考證了詞調命名的十一種方式，如以詞中所詠之事物、以詞中之情意、以詞中之字句、以地名、以人名爲調名等，既簡明扼要，又具有相當的概括性。對於同調而異體的現象，詹安泰力奉萬樹《詞律》爲「能於荆棘之內力闢康莊，實爲詞學中一最宏偉之貢獻」，亦可見其不凡識力。正如詹安泰的弟子、詞學名家邱世友教授所說：「詞的聲律、音韻和詞譜，先生最爲專門。」〔二〕詹安泰構建的詞的聲韻譜體系，不僅涉獵廣泛，而且論述專精，可視爲傳統詞的聲韻譜理論的總結和提高。

其二是關於詞的作法研究。《詞學研究》從第四章至第六章《論章句》、《論意格》、《論修辭》、「章句、意格、修辭、俱關作法，稍示途徑，庶易命筆」。這三章系統闡述了作詞的具體方法和途徑。詹安泰認爲詞的字、句與章法是講究詞的總體格局的前提。蓋詞的用字在一般的音義之外，還有所謂添、減、偷、襯等法，句法又特爲參差，加上章法繁複，有的甚至變化無方，體制上有令、引、近、慢等的不同，篇幅有單調與雙調、換頭與不換頭、單體與聯章等種種不同，詹安泰將填詞創作中常用但音義各異的情況，以及詞中添、減、偷、襯之字的情況作了簡要整理，特別是將常用的虛字作了歸類。在句法上，則將從一字到七字句的平仄之法一一列舉分析，並對句子的組織和正變作了細緻的分析梳理。在章法上，

〔二〕 邱世友《永遠懷念的追記》，《詹安泰紀念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四月，第四十八頁。

則分單調、雙疊、三疊、四疊等情況分類敘說，其細微精審，確實令習詞者有迹可尋。

章句屬於一定之法，命意用筆是在此基礎上的翻新變化。故《論章句》之後接以《論意格》。詹安泰認為命意在審題之後，如果題材不合乎詞的體制要求，就不違言命意之法了。他總結前人論命意之法大要分清新、高妙、幽遠、沉摯、層深、超奇、空靈、婉曲、含蓄九種，每種之下，先以釋語，繼而引列前人相關論說以作佐證。如「清新」之法，詹安泰解釋說：「意由己出，不經前人道過，而又不涉晦澀暗昧者，謂之清新。然非不可運用古事或引用古人成語也，古事古語，能加以變化，或位置得宜，均不失其為清新。」即一方面強調非冷僻的原創，另一方面將古事古語「點鐵成金」也可視為是一種創新。接下分引楊纘、張炎、沈謙、沈義父、李漁、俞彥等人觀點，或正或反，印證此說。其他各法，理路同此。命意既定，次論用筆。詹安泰將傳統的提、頓、承、轉、順、逆、正、反等筆法，按照全篇、起、結、過片的順序一一舉證論列，細緻明了，頗便學詞者臨摹仿效。

《論修辭》是現存《詞學研究》中篇幅最長的一章，近五萬字，是其用力所在，也是至今為止最為完備、最成體系的詞體修辭學。詹安泰按照普通修辭學的原理，結合詞的具體體制和實踐，分「詞之修辭與作風」、「詞之修辭與方言名物」、「詞之修辭與詩歌」、「詞之修辭與散文」、「詞之修辭諸現象」五個專題，既有對詞之具體修辭的縱向開掘，又有對詞與相關文體的橫向對勘比較，總體上構成了兼具總結和開創意義的細緻綿密的修辭學體系。如在「詞的修辭與作風」部分，詹安泰按作風形成的時代先後，分詞的作風為拙質、雅麗、疏快、險澀四種。四種作風與修辭彼此之間也有異中之同：「疏快薄采藻略近拙質，而視拙質為奔放。險澀重采藻略近雅麗，而視雅麗為斫削。」這種既注意「類」的分析，又注意

「跨類」的溝通，確實是符合詞史實際的。其他諸如對以詩入詞、以經史諸子散文等入詞，詹安泰都做了仔細的舉例分析，在比較與互勘中凸現詞之修辭的特殊性。至於「詞之修辭諸現象」一節從配置辭位、表現聲態、增擴意境、變化本質四個方面來總體概括詞的修辭現象，更是梳理規則，示人以津梁。

其三是關於詞的精神研究。詹安泰以《論境界》、《論寄託》兩章來集中闡述詞的精神意脉與擴大詞的作用和尊崇詞體的關係。《論境界》一章在一九五一年前即已完成，但目前已散失無法窺其原論。《論寄託》一章一九三六年發表於《詞學季刊》，可能是《詞學研究》中最早成文的一篇。常州詞派鼻祖張惠言曾在《詞選序》中以「意內言外」釋「詞」之本義，並通過「義有幽隱，並為指發」的批評實踐，使填詞創作和詞學批評轉為重視詞之內蘊。不過張惠言的「寄託」理論實際上還只是停留在草創階段，至周濟始深化了寄託理論，他先是在《介存齋論詞雜著》中提出「初學詞求有寄託」，「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的主張。繼而在《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中提出「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的理論。自此直至民國時期，周濟的寄託說一直引領着詞學發展的潮流，但對寄託說的理論源流和形態特徵的系統探討却一直乏人問津。詹安泰的《論寄託》在這一學術背景中便顯得特別醒目。詹安泰在明辨張惠言、周濟、譚獻、劉熙載、陳廷焯、況周頤、吳梅諸家有關「寄託」的論述的基礎上，認為寄託的經典形態應該是在外在形式上脫略寄託痕迹，不落言詮，「不易知其情之所由生與其意之所專指」，以此與簡單比附的透明狀態的寄託區分開來。詹安泰認為，寄託的顯晦，實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他說：

唐五代詞……不必有深大之寄託。……北宋真、仁以降，外患凌亟，黨派漸興，雖汴都繁麗，不斷歌聲，而不得明言而又不能已于言者，亦所在都有，於是辭在此而意在彼之詞，乃班秩以出。

及至南宋，則國勢陵夷，金元繼迫，憂時之士，悲憤交集，隨時隨地，不遑寧處；而時主昏庸，權奸當道，每一命筆，動遭大謬，逐客放臣，項背相望，雖欲不掩抑其辭，不可得矣。故詞至南宋，最多寄託，寄託亦最深婉。

詹安泰結合政治背景來探討寄託的創作動因，確實提升和拓展了寄託的思想境界。

詹安泰結合詞史以分析寄託說的形成過程及理論內涵，他非常獨到地考察了常州派與浙派的內在聯繫與理論欠缺。他認為朱彝尊在《詞綜·發凡》中提出的「詞至南宋始極其工，宋季而始極其變」之說，也可以從寄託一端求得理解，他說：「其所以求工或變者，固不僅辭章技術之關係，蓋寄託所在，不得不求工或變也。惟極其工，極其變，其寄託乃不傷蘄露，不易指陳。」這是對浙西詞派新的考量，並以寄託作為聯結其與常州詞派的紐帶，使一向呈對峙狀態的詞學兩派有了共同的內質，體現了詹安泰過人的識力。他敏銳地看到常州與浙西兩派在所標榜的理論與推崇的理想都存在矛盾：「常州詞老專尚寄託，而高談北宋；浙水詞人，不言寄託，而侈論南宋，均使人不能無所致疑於其間。夫以寄託論詞，北宋固不若南宋之富且深也，常州諸老豈不喻此，而存一代不如一代之見？而卒至衡詞主旨，與選詞標準不甚相入者，則其只主寄託而忽略詞家考證之業，有以致之也。夫不使人從考明本事中以求寄託，則望文生義，模糊影響之談，將層出不窮；穿鑿附會，又奚足怪！」兩派理論確有思慮欠周之處，但此前詞論，鮮論及此，詹安泰慧眼拈出，啓人甚多。

詹安泰寫作《詞學研究》最後四章的初衷，是在學詞的基礎上瞭解詞史的發展脈絡和正變之迹，廣其學識，博其趣味，鍛煉相關的學術判斷力，形成自成一家的詞學觀。但直到一九五一年，尚未寫成。